



中国近代战争史（六）

李大伟 编著



目 录

讨袁战争	1
袁世凯篡权后的倒行逆施	1
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作战总	7
江西讨袁作战	11
江苏讨袁作战	21
各省讨袁相继失败	33
讨袁战争的教训	36
白朗起义战争	40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40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	42
打破两次“围剿”	47
西进陕甘	54
回师豫西	60
白朗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64
护国战争	68
袁世凯复辟帝制	68
护国战争	72
四川战役	79
湘西之战	97
滇桂边之战	102
护国战争的结局	104
护国战争的经验	109

讨袁战争

讨袁战争（也称“二次革命”或“癸丑之役”），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革命战争。战争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失败，北洋军阀势力乘机伸展到南方各省，开始了全国性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这次战争，遍及南方七八省，本章重点叙述江西和江苏两个主要战场的作战情况。

袁世凯篡权后的倒行逆施

一、破坏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虽然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但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据有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七八个省和几十万军队，在临时参议院中还有相当的力量，在人民中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袁世凯采取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分化、打击革命力量，破坏民主政治，以便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前，曾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并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和外交官员，制定官制、官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约等，须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

及命令，须经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孙中山企图用这些条文束缚袁世凯的手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违背了“谨守宪法”的誓言，无视共和政体，肆意践踏临时约法，凡事置内阁于不顾，专横跋扈。1912年6月，袁在王芝祥的任命问题上，公然破坏公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规定，独断专行，将内阁总理唐绍仪逼得弃职出走，农林总长宋教仁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也愤而辞职。唐绍仪辞职后，由陆征祥任国务总理。不久，又由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取而代之，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到北京，各党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党主要由一些立宪派、旧官僚政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骨干组成。它们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力图控制国会。同盟会则在宋教仁等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于1912年8月建立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当时表示自己从事实业，故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企图在妥协中求发展，幻想在暂时维持袁世凯个人权位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朝野合作”、政党竞争、发展实业等措施，扩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进而组织责任内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四出奔走游说，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希望由国民党组织内阁，以分袁之权。宋教仁的活动，触怒了寸权不让的袁世凯。他派人于1913

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暗杀。“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一些革命党人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重新走上讨袁的道路。首先主张武力讨袁的是孙中山。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孙中山认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黄兴、陈其美等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于“宋案”，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当时，不少国民党要人与黄兴持相同态度，孙中山孤掌难鸣，只好暂时作罢。革命党人的犹豫不决，为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充裕时间。

二、加紧战争准备，策划镇压革命

（一）裁遣革命军，扩充北洋军

以武力消灭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实现专制独裁统治，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以欺骗手段削弱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则是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

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建立，全国陆军总数约九十八万六千四百余人。这些军队，分别以南京临时政府统辖的南方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为中心，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军事阵营。南方革命军共有陆军八十个师团，约四十五万人。仅江苏一省就集结了二十多个师，约十五万人。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后，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主持留守府，统辖南方各军。革命军控制的南方各省，地形复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有比较优越的地理和物质条件。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有北洋新军第一至第六师和第二十师，禁卫军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总数约十一万四千人。北洋军主要驻扎于冀、鲁、豫三省，其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北各个地区。这些地区除山东外，

多为贫瘠之地，农业产量较低，工商业不够发达。因此，北洋军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础。

靠反动军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凯，深深懂得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就职之初，首先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军人对于本大总统，有服从之义务”；接着，袁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而“倡议裁兵”，同时对驻宁十几万军队扣饷不拨，并散布南京留守府“拥兵自卫”、“势同树敌”的舆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迫其撤守、裁军。革命党人看不清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到兵权对革命的利害关系，客观上也遇到了军饷匮乏的困难。黄兴等为使“南北嫌疑尽泯”，达到“行政统一，民国基础自趋巩固”，立即对革命军进行裁撤。驻宁军队按照“客军各回原省，留宁之军汰弱留强”的原则，先后解散了十余万人。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动撤销。在江苏的影响下，南方各省纷纷效法。如湖南原有五个师两个旅，缩编为五十三个守备营和一个混成旅；湖北原有八个师两个混成旅，先后裁减五个师；江西也裁减八个团以上。到讨袁战争爆发时，由革命党人控制的军队仅剩十余万人。其中，江西有两个师一个混成旅，江苏有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安徽有一个师，湖南有一个混成旅，广东有两个师一个旅，福建、四川各有一个师。

此外，袁世凯还施展种种伎俩，拉拢收买南方革命军的军官，破坏南方革命军的团结，并制造借口，枪杀革命军将领，排斥革命党人，使革命势力受到削弱。

与此相反，袁世凯所控制的武装，非但没有减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胀起来。在此期间，除继续加强北洋陆军七个师和中央禁卫军一个师外，袁又命冯国璋将

原直隶陆军第一标扩编为混成旅，以刘询为旅长；把为镇压武昌起义而招募的备补军五路（每路五营）改为拱卫军，另增募备补军五路（1913年2月改编为护军，直隶中央）；将原驻奉天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改编为陆军第二混成旅；令倪嗣冲在皖北编练新军二十余营；另增编骑兵第二旅和陆军混成第一团，直属陆军部。这样，到1913年初，仅北洋军和直、豫、鲁三省军队，就已达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余人，总数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军，改变了武昌起义后南多北少的兵力对比情况。

（二）大量购置军火

袁世凯在加紧扩军的同时，还大量购置军火，提高军队战斗力。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陆军部派专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订购大宗军火，计有野炮十八门、机关炮四十门、机关枪八挺、1888年式快枪五万支、各种子弹四百万发。另向奥国订购1895年式曼利夏步枪一万四千支。同时，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枪弹五十万发解送扬州，交徐宝珍师储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汉阳兵工厂赶制枪炮运送北京，装备北洋各师。袁还通过大军火商雍剑秋接收德国艾哈德兵工厂“无偿送给”的步枪六千支，口径为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战争打响后，德国公使又通过雍剑秋送给袁世凯步枪一万支、口径为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枪等军火一批）。另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出面，向德、美、奥等国订购新式鱼雷艇，其中德国四艘、美国三艘已于1913年初驶达上海。这样，北洋军在装备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南方革命军。此外，袁还秘密派人携大宗款项，到武汉等地购买粮米，以备军用。

（三）举借外债，筹集战争经费

袁世凯大搞扩军，使国家财政更显拮据。根据北洋政府的预算，1913 年度的财政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余元，而支出则为四亿九千七百八十七万余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余万元。而这一年全国军费开支预算，仅陆军就达二亿元以上，后虽一再压缩，仍达一亿六千余万元。加上海军用费九百八十七万元和各项临时开支，全部军费约占总支出的五分之二。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仍远不能满足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袁不惜饮鸩止渴，以各种手段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据统计，从 1912 年 1 月到 1913 年 4 月中旬，袁世凯向外国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购买军火、充当军政费用的借款有十七次。款项较大的有：1912 年上半年从外国银行取得的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1912 年至 1913 年瑞记洋行的三次军火贷款（共三百五十万英镑）；1913 年 4 月 10 日与奥国签订的购买军舰借款（三百二十万英镑）。这些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主权或接受高额利息而获得的。但是，袁世凯仍不满足于以上借款，又于 1913 年 4 月 26 日背着国会，与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合同规定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为担保，并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监督中国财政开支。

袁世凯通过“善后大借款”，博得了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同时更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革命党人尤表愤慨，纷纷通电指责，要求袁“立罢前议”。孙中山向五国银行团写信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非法借款。对于革命党人要求严惩暗杀宋教仁的凶犯和反对借款的呼声，袁世凯斥之为“有意破坏，煽动讹言，逞少数人

权利之私图”。5月21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除捣乱外无本领”；声言“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三都督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先后下令将三人褫职。与此同时，密令北洋军沿京汉、津浦路向南开进，决心推行其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计划。

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作战总

方针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一、袁世凯的作战总方针和兵力部署

早在1913年4月30日至5月3日，袁世凯就连续召集段祺瑞、段芝贵，陈宦、江朝宗、冯国璋等亲信及归其统辖的各省军队要人开会，策划武力对付南方革命党人的办法。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确立了“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初步拟定了对南方革命党军队作战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把用兵的重点放在湘、赣、皖、苏四省；而以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为交通运输线；以武汉、徐州为进攻出发地；以海军策应陆军作战；拉拢滇、桂、黔三省军队作为牵制力量。为实现这个作战方针，确定了如下作战部署：

1、沿京汉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湘、赣、皖三省。以驻信阳的北洋第六师（欠一部）为主力，河南第一师及混成旅为预备队，由鄂向赣进攻；以驻皖北的倪嗣冲所部（约步兵一个师、骑兵二个营）、河南雷震春的护军一部（约步兵五个营、炮兵二个营、骑兵一个

营)以及赵倜所部毅军(约步兵十一个营、骑兵二个营),进攻皖省;北洋第二师为京汉路方向总预备队。另以北洋第六师一部和黎天才的湖北第一师一部,分别驻守武昌、汉阳、汉口。黎师另一部及雷震春护军备补兵一部,自荆州至新沟、蔡甸一带设置防御阵地,警戒湘省。

2、沿津浦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江苏南京。以驻鲁南的北洋第五师、驻兖州的张勋武卫军(约十九个营)为主力,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山东混成旅之一部为预备队,经徐州进攻南京;山东混成旅另一部防守济南;扬州徐宝山部(约步兵一个师)为牵制部队。

3、以拱卫军、北洋第二师一部并奉军一部,负责防守北京。

4、以驻张家口的何宗莲第一师为机动部队,防备粤军由海路北上,或准备由海路南下攻粤。

5、姜桂题毅军驻张家口一带,防御蒙军袭扰。

6、调闽军一部进驻上海,并调驻西陵、南苑、定县等处的第三师一部随往,以防不测。

7、第三师及第一师另一部由海路运往南方,登陆地点临时决定。

此外,对由革命党人任都督的湖南、广东,也作了相应部署。对于湖南,一旦谭延闿响应讨袁,即三路出兵进攻:一路由贵州的唐继尧派驻在镇远的部队直下常德;一路由陆荣廷派广西的部队由南向北进攻;一路由黎元洪派部队由岳州向南进攻。对于广东,若陈炯明宣布独立,则任命副护军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所部进攻广州。另派海军游弋于闽、粤海面,以防止闽粤两省与南京联为一体。

要进军南方,必先控制湖北,所以袁世凯极力拉拢

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李烈钧被免职后，黎又兼江西都督）。而黎此时已完全投入了袁的怀抱，他致电袁世凯，表示“元洪惟知服从中央”，“决无瞻顾”，决计让北洋军开进湖北，并取得了部分作战指挥权。

袁世凯将北洋系统的绝大部分兵力直接用于对南军作战，但按实际编制，各师的兵力只有七成左右，要实现其总的作战企图，兵力仍显单薄。为此，在直隶、河南、安徽、山东设立募兵机构，计划招募新兵二万左右。

这样，袁世凯完成了战争准备和部署，摆出了决心消灭南方革命军的咄咄逼人的阵势。

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战争端倪明显可察的情况下，孙中山再次呼吁革命党人丢掉幻想，实行武力讨袁。他指出：“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它办法”。孙中山分别致电湘督谭延闿和粤督陈炯明，要求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谭、陈在回电中均借故推诿。孙无奈，欲亲自赴粤发动讨袁，当即被人劝阻。孙又提议由陈其美先在上海宣布独立，打响讨袁第一枪。陈其美、黄兴等人坚不同意，认为“据数里之地以抗敌，犹执卵投石”。此时，驻沪海军前来接洽，愿意宣告独立。孙甚喜，建议海军由海上进攻津沽。陈其美等人反对海军先发，认为“须海陆并起”才行。不久，驻沪海军奉袁世凯命令开赴烟台。孙闻讯后，急欲劝阻，指出：海军“开赴烟台，恐将生变”。陈、黄则认为“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结果，海军北上后即被袁控制。孙中山别无他法，决定派人去策动南京第八师几个忠于革命的营长，先“冒险一发”，以树立讨袁的旗帜。黄兴初则力言不可，认为那样将使“八师先自相

战斗”，后见孙中山主意已定，并准备亲往南京，只好服从孙的意见，遂定下武力讨袁的决心。但黄又认为孙“不善戎伍”，且恐孙“轻身陷阵”，遭到不测，为留孙“以任大事”，便自告奋勇代孙前往南京指挥作战。

革命党领导人在要否武力讨袁和如何讨袁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结果丧失了战机。7月初，原江西都督李烈钧潜赴上海孙中山处，表示愿意率江西军队首先发难。孙遂决定李烈钧回江西发动，黄兴去南京发动，其它各省伺机响应。

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人虽然确定了武力讨袁的决策，但整个国民党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真正统一。在北方的国民党议员中，少数人离开国会到南方参加讨袁战争，不少人仍呆在国会中醉心于“法律倒袁”。在南方的国民党都督中，也是各怀心计，涣散不齐。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及江苏的程德全，非旧官僚即立宪派，他们观望气候，随风摇摆，不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安徽的柏文蔚和广东的陈炯明，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完全掌握军队；唯有江西的李烈钧态度明朗，讨袁坚决，并掌握着一部分比较可靠的军队，但力量有限，难于影响全局。此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有组织统一的作战指挥中心和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对于与战争有关的其它重大问题，诸如军队的调遣、动员，兵员的训练补充，粮秣弹药的保障等，都未研究和解决。这都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宣布独立的各省，曾制定过各自的作战方案。如粤省拟派三个支队出师北伐，以一个旅援助江西；安徽拟以一部兵力阻击倪嗣冲军，另一部兵力渡江援赣；四川拟在攻占重庆后，顺流东下；沪军则准备攻占制造

局，控扼吴淞口等等。这些方案也因种种原因，均未能顺利实现。

江西讨袁作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一）北洋军的部署

早在 1913 年 5 月初，袁世凯就命豫南总司令兼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率该师由信阳向湖北之兴国（今阳新）、蕲春等处移防，王占元之第二师随后跟进。副总统黎元洪指令李纯：“贵师将来开至兴国、田家镇一带，选一待机阵地，一旦有事，即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5 月中旬，李纯以该师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步兵第二十一团附机关枪、骑、炮各一连开赴田家镇，并分兵一部进驻武穴，警戒九江及安徽方向；以第二十二团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及机关枪两连，骑、炮各一连，进驻兴国，监视瑞昌方面之赣军；师部及第十二旅之二十三团、二十四团进驻蕲春、蕲州一带，准备寻机渡江。上述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即对江西的地形及赣军分布情况不断进行侦察，并进行渡江作战准备。

7 月 2 日，已被袁世凯收买的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密电黎元洪，告知他革命党人准备在九江起事，并要求袁世凯“速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九江），以资镇慑”。袁闻报后，即令第六师渡江南进，第二师一部迅速由鄂北南下，与第六师会合（两师共约一万五千人）；另调驻辽阳之第二十师一个旅进关赴鄂，作为进攻江西的二梯队；抽调第二师、第三师各一个团进驻武汉设防，奉军一个旅进驻孝感一带，保护武胜关以南铁路线；另由海军次

长汤芑铭率“飞霆”号等军舰五艘，驶往江西，策应陆路进攻九江。该路军队由黎元洪节制。

7月6日，第六师所属吴鸿昌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并电话、卫生各队，先行渡江，开赴江西。10日，该师主力从官牌夹（九江西约四公里）登陆，全部抵达长江南岸。李纯以萧安国第二十四团两个营驻九江城西部，与驻城东部的赣军四个营同城相峙；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进驻沙河镇（九江西南十五公里）、莲花洞（九江南十二公里）一线，警戒德安方向赣军；以张敬尧率第二十二团第二营一连、第三营及周文炳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附机关枪一连，进驻金鸡坡（九江东四公里）、八里坡（九江东南三点五公里）至马宿岭（九江东南七点五公里）一线，警戒姑塘及湖口方向的赣军；以第二十四团一个排进驻洗心桥（九江西二十公里），警戒瑞昌方面赣军；以混成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第二十一团第二营、第二十四团第二营、炮二十团第二营、机关枪第四连进驻官牌夹，为总预备队。这样，北洋军第六师约七千余人占据了九江外围诸要点，形成了对九江城的包围和对九江以南赣军的进攻态势。

（二）赣军的部署

战前，赣军共有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计十个团。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欧阳武驻南昌，所部第一旅旅长林虎率第一、二两团驻德安、瑞昌一线；第二旅旅长余维谦所部第三团两个营驻九江，第四团是新兵，随余驻南昌训练。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所部第三旅旅长赵复祥部第五团驻南昌，第六团两个营驻九江，一个营驻德安；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驻赣州；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率周璧阶第九团、金其昌独立营驻姑塘，所属第十

团李明扬部驻湖口。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赣军主要集中在九江以南和南昌以北地区，在长江沿岸的重镇九江只配置了一个师部和四个营的兵力，湖口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省城南昌的防务也很薄弱。

1913年7月8日，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湖口，立即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量讨袁事宜。12日，得知驻守德安之林虎部已与北洋军接火，遂宣布江西独立。同日，省议会在南昌开会，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李烈钧等拟定作战计划如下：将所有在赣北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以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指挥第一、二团和第六团一个营，进攻沙河至十里铺一线之敌，得手后进取九江，以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所部第九团和独立营从姑塘进攻九江。另以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李明扬第十团守卫湖口，李烈钧亲往督战。部署略定，李又委托欧阳武给广东陈炯明和湖南谭延闿分别写信，要求两省派兵援赣。赣军的战略意图是夺取九江，消灭南犯之敌。

但赣军内部并不巩固。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完全投靠了袁世凯；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早与李烈钧不睦，并与黎元洪、袁世凯秘密勾结，表示对李烈钧“阳奉阴违，以作牵制”，准备配合袁军作战；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因受袁世凯拉拢，反袁也不坚决。赣军两师两团中，真正受李烈钧指挥并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林虎从南京带来的步兵第一团（附机关枪两连、炮兵一连）和伍毓瑞的第三团，不足三千人。与北洋军相比，赣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

二、九江、湖口之战

袁世凯侦悉李烈钧回到湖口准备发难的消息后，遂

指令李纯师的过江部队迅速向南推进。7月10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越过沙河，不断向赣军开炮挑衅。

7月11日，驻守德安的赣军旅长林虎致电欧阳武，报告北洋军寻衅情况，请求速发援兵。12日拂晓，林虎分兵二路向在当面寻衅的袁军发动进攻：以主力沿铁路向沙河进攻，另派一部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策应正面。从此，揭开了武装讨袁的战幕。袁世凯指令李纯对赣军“即按叛兵剿办”。李纯一面令驻沙河之吴鸿昌团阻击赣军，一面命驻十里铺之萧安国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萧团于途中与林虎派出的策应部队遭遇，前进受阻。林虎旅装备比较齐全，部队经过一定的训练。其主攻部队经一昼夜战斗，夺占了沙河镇，进据铜鼓岭、骆驼山等处炮台。吴鸿昌团死伤三百余人，向赛湖方向败退。李纯惊慌失措，从官牌夹逃回停泊在长江中的座舰，急电袁世凯“万乞迅派增援，以救危局”。但林虎旅首战告捷后，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歼敌良机。

沙河方面开战后，驻九江城内的赣军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与同驻该城的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和第六团团长李定魁等磋商，计划趁北洋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以赣军第三团之一营与第六团之两营，迅速歼灭北洋军驻九江城西的两个营，以第六团之另一个营为预备队，监视陈廷训的炮台兵；待解决城西两营敌军后，率部沿庐山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袁军，配合林虎旅作战。此计如能实现，将陷李纯师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不料李定魁竟于次日违约，按兵未动。伍毓瑞见情况突变，即弃军逃往湖口，所部一个营转移湖口，一个营投附刘世钧。九江城全为北洋军所占。

当北洋军第六师右路在沙河战败，向赛湖以北撤退

时，又得悉姑塘方面方声涛之右翼赣军亦准备向九江推进。李纯急忙调整部署：令马继增率预备队在官牌夹构筑防御工事；令驻九江城西的二十四团迅速抽调兵力，协同二十二团之一、二营加强城南十里铺的防御；令二十一团第一营加强城东南之八里坡的防御；令张敬尧率混成二十二团第三营、第二营第六连及机枪、山炮各一连，协同陈廷训部守卫金鸡坡炮台及普应寺一带。这时，北洋军第六师已呈背水之势，官兵慌乱。李纯也自称“力尽智穷”，一日数电袁世凯，“惟乞援军迅到”。

7月15日，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令该师驻鄂各部迅速开赴九江，其任务是：进攻湖口，并配合第六师进攻德安。王占元接电后，即于当日派朱廷灿第七团由汉口开赴九江；16日，又派步兵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率步兵第五团一、三营（携管退炮八门）及机关枪连开赴九江。第二师其余部队，拟在第二十师和第三师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同日，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李纯为第一军左司令，王占元为第一军右司令，以统一前线的作战指挥。

林虎旅进占铜鼓岭、骆驼山后，欧阳武又令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率领驻南昌的第四团和第五团开赴德安，计划与林虎旅会合后，以主力从青山（九江西南十二公里）、瓜子岭（青山北）向正面进攻，分兵一部从铜鼓岭侧击十里铺之敌，然后一举拿下九江。但赣军动作迟缓。16日，赣军与袁军在赛湖一带作战，虽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因兵单势孤，未敢追击。17日，北洋军第二师的两批援兵已先后赶到九江，会同第六师马继增旅向赣军反扑。而这时赣军担任前沿警戒的第六团一个营忽然叛变投敌，遂使林虎旅军心浮动，放弃铜